

置身当下,让我们与那些诗破镜重圆



李修文(中)、苏童(右)、何平谈论古典诗歌与当下 出版社供图

“来见我”的诗人——
我们的困顿、失败
古人都曾遭遇过

苏东坡:从来没有真正恨过人

年轻人的那些怀才不遇、迷茫失败,千百年前古人就经历过了,而中国古典诗歌三个最重要的代表性诗人——李白、杜甫和苏东坡,体现了人活于世的三种态度。

李白代表我们的彼岸。他在我们当中,但时刻准备脱身而出。他的一生都生活在一场奇迹之中。他是一个伟大的命名者,经由他的肉身,他重新帮我们发明了河山,发明了万物。

杜甫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都无法逃避的处境。人到中年就会遇到杜甫。觉得很苦楚、很困顿的时候,你会发现一切渴望、失望、得到的、得不到的、注定失去的,在一切要害的地方,杜甫总有一首诗等着你。

苏东坡则代表着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与自己的和解。苏东坡如此困厄,他的政治命运自不必说,他是一个被禁言的人,他给朝廷的每一个朋友写信最后都要加一句“看必火之”,看完了必须马上烧掉。但苏东坡不怕露破绽,也时刻不忘和万物相亲、和他人相亲,并且找到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。他一生颠沛流离,还发明了那么多道菜,每到一地方都会切实地施政,在杭州当太守时修了著名的苏堤,还发明了把桃树和柳树间错开种,这才产生了著名的成语“桃红柳绿”。

而且苏东坡没有真正恨过人,苏东坡一生中有许多悲剧都是王安石造成的,但他从闽南发配回来去看了王安石,两个人相携,就在南京和解了。林语堂写的《苏东坡传》写了他俩的很多渊源,后来有人看了这本书就不干了,他说苏东坡都不恨王安石,可是林语堂非要让我们代替苏东坡来恨王安石,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。

韦应物:在抚养三孩的过程中,理解了什么是生活

我的这本书里还写过一个人,叫韦应物。他出自于贵族,曾祖父是著名的韦待价,在武则天时当过宰相。韦应物出身在这样的家庭,13岁就被唐玄宗选为进士。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,叫做“身作里中横,家藏亡命儿。朝持犗蒲局,暮窃东邻姬。司隶不敢捕,立在白玉墀”。什么意思呢?他每天走路都是横着走,家里藏着亡命之徒,每天早晨起来前往赌局,到了晚上要去偷窃邻居家的姑娘,警察都不敢抓捕,只好站在白玉台阶下看着他。就是这样一个人,安史之乱发生,玄宗跑了,他的生活从此开始四处流落,惊慌失措。他的文风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,大家都很熟悉他晚年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诗,“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”。在我看来,这两句诗就是一种能够自我完成,既原谅自己,也原谅他人,也原谅这个世界的诗。

但是他走到这一步非常艰难,他的妻子去世,给他留下三个孩子,两女一儿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翻看韦应物的诗集会发现,他大量的诗集都在表达他如何悲催烦闷、又格外认真地养育这三个孩子。长女出嫁的时候他写过很多诗,字字句句,都是一个老父亲。养育孩子让他从根本的维度上,更加深切理解什么是生活。

我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诗,“自当安蹇劣,谁谓薄世荣”。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说,我肯定是安住在我的陋劣愚笨里,但我绝不会因此鄙薄世界上那些愚笨,有时候虚荣才能救命救人。所以他不以一己之悲来夺全世界的功利和人心,他也绝对不会因为自己受过的苦而迁怒于他人。

大思想家、大学问家王船山(王夫之)特别欣赏他,说他的诗“知耻之诗”。“耻”有的时候是一件好事,说明了你知道害怕、恐惧,也知道人之为人面对许多庞大事物时候的那种深深的无力感。像韦应物这样的人,他并不是在观看自己的丧,他在丧里面重新出发。

《诗来见我》是鲁迅文学奖得主、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的最新散文集。所收录作品大部分完成于2020年春天,最早以“诗来见我”专栏的形式刊登在《当代》杂志上,今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在书中,李修文走进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元稹等人的世界,写他们人在江湖的无奈与感叹,写他们犹在笼中的挣扎与艰辛。与此同时,作家将一首首古诗与当下的个体生命与人生际遇相连接,感知每个人身上那份挣扎于生活时产生的勇气与赤诚。

近日,李修文携新作《诗来见我》来到南京,与作家苏童、文学评论家何平一起,分享自己的创作体验。为何“诗来见我”?如何“以身作器,重返古诗词现场”?散文可以是一种可以包含想象和虚构的自由文体吗?三位对谈嘉宾从各自的角度深度解读了这部作品,以自身的真性情体味古人心意,透视古今往来的人生苍茫,探索文章千古事的真髓本意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
陈曦 姜斯佳



《诗来见我》
李修文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2021年3月

以身作器,重返古诗词现场

李修文表示,虽然早已发心要写一本关于古诗词的书,但终于动笔,还是源自去年那场疫情。

写母亲,是因为身处封闭中的武汉,与在荆门的父母分隔两地,便在古诗中寻找关于母亲的诗句消愁;每晚打开手机视频和朋友们隔空把酒聊天时,饮酒的诗句自然浮现出来,他就写了“酒悲突起总无名”;当看到楼下的花丛因为过于频繁的消毒而枯萎时,他又“感时花溅泪”……这些真切的感觉成了李修文写作《诗来见我》最重要的契机,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完成于疫情期间。

这就是为何“诗来见我”。李修文说:“我们中国人,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,总有那么一两句诗词在等着我们,见证着我们,或早或晚,我们都要和它们破镜重圆,互相指着彼此。”

李修文称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写小说写不出来,然后做编剧又做得非常失败。但在做编剧的十几年间,他参与了很多农村戏、民国戏、革命戏,这种题材的拍摄地往往在乡间,“当你置身于那些地方的时候,发现这原来是王昌龄、王维、白居易曾经来过并且留下诗歌的地方。随着千百年的历史演进,我们好像也没有变成另一种人,我们似乎还行走着古人的那些诗歌诞生的关口,那样一些要害或契机当中,所以就朦朦胧胧地想写这么一本书。”

在这些诗歌现场,李修文也领悟了“文章千古事”的要义:“我不敢说个人的写作有什么意义,我只想通过我的写作,去召唤一些可能的读者,去靠近那些诗歌诞生的幽微时刻,也许它会成为未来我们面对困顿、苦难的一种路径。”

何平将《诗来见我》视作李修文通过古典诗歌写就的个人编年史。“如果我们把书中的诗词列出来,最终回到的不是古典诗词的现场,而是回到了当下,有着当下的生存境遇,当下的人生困惑,又有个人命运的‘我’,这就是《诗来见我》的文本意义。”

谈到诗歌与当下、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关系,苏童说起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件小事。有一次他去花店看到矮牵牛,很喜欢,但又觉得矮牵牛娇气,碰到刮风下雨,花瓣就全掉了,不太想买。花店老板娘立刻怼他:“大哥,我看你戴着眼镜还像有文化的样子,你没听过一首诗吗?‘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’,夜里风雨你一定要搬进去的,所以那不怪花,怪你啊。”对此,苏童笑着感叹:“我们古典诗词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已经跨越了文化这个门槛,它进入人的精神,渗透进你的生活,甚至变成一种常识,这是它的伟大之处。”

苏童评价李修文是一个有着古典江湖气息的人,文字“有着非常高的体温”。

“李修文所说的‘以身作器’,就是一次身体力行的召唤。”

散文家向小说家学什么

在苏童看来,《诗来见我》写得很好看、很容易读,得益于一种小说家的训练。“写小说出身的人写散文会有一种直觉,就是生活当中的某个遭际,我一定会写出来。所以‘诗来见我’,一个古典诗词,还有一个就是过往生活中暂时搁置的记忆,一起来见他。”

苏童分享了书中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两个故事。“李修文写自己有一天意外跟朋友错过了,被困在了黑灯瞎火的影视城里,没有食堂,不知道去哪里吃饭。正在绝望的时候,一个朋友发短信告诉他,说给他留了一锅饭菜,在电饭煲里,那个电饭煲在影视城里的龙椅下面,因为只有那个龙椅下面有一个电插座。这种江湖情谊的温度,这些生动而奇异的经历,拓宽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想象力。”

还有一篇苏童也很喜欢。“李修文有段时间住在一座蔬菜大棚里面,遇到一个兄弟。那兄弟很孝顺母亲,蔬菜大棚里供奉了母亲的一张照片,很沉重。好多年以后他又跑那个地方去了,那个大棚易主了,但那个照片居然还在。我就想这是真实的吗?我后来想一定是真实的。我们判断一个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有没有虚构,其实是看得出来的,这个分辨就是细节——如果所有的细节都是顺拐的、正常的,往往都是虚构;但是如果你发现它不是顺拐,而是觉得很别扭,但是你细细一想,一定是真实的。这个我很喜欢。”

何平认为,《诗来见我》写到的人物,往往是一些“无名者”,电工、泥瓦工、乡镇教师、超市小老板、乡镇文学青年……读这本书,可以看到生机勃勃的江湖世界。何平说,散文作者通常是有一个人设的,散文写作者很难把自己藏起来。如果把《诗来见我》里面的诗歌全部摘录出来,就可以发现怎样的诗来“见”了李修文,李修文是个怎样的人。

“李修文在书中的‘人设’,并不是一个学识丰富到可以上《百家讲坛》的人,他不是以专业研究者的身份来介入诗词现场的。李修文有自己的路线图,他行走在那些诗人曾经走过、今天依然还是乡野的地方,这跟很多写作者是不同的。”何平说。

一些读者看了李修文的散文,觉得书中的那些片段、那些人,太富有戏剧性了,忍不住要问:这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,是真实还是虚构?对此,李修文表示,他一直觉得这个事不重要,重要的是,最终产生的美学上的真实能否逼进我们内心的真实。“我是要写作,而不仅仅是为了哪一种文体去写作。对于我来讲,唯一的真实就是无限真实的精神个体。”